

于时空深处书写城市精神

——“现代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化表达——上海·深圳城际文学对话”侧记

□本报记者 教鹤然

城市承载着万千烟火与发展期许,不仅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活动的中心,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从“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六个维度擘画了城市发展的新蓝图。此次会议标志着我国的城市发展理念正在从追求规模、速度和外在形象的“外延式扩张”,转向关注质量、效益和内在品质的“内涵式发展”,为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锚定了方向、明晰了路径。因此,“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城市文学”成为时代赋予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重要命题。

12月17日,由文艺报社、深圳市文联主办,深圳市公共文化艺术创作中心(深圳画院)承办的“现代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化表达——上海·深圳城际文学对话”在深圳福田区图书馆举行。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萌芽》杂志社社长薛舒,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李伟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项静,深圳市作协副会长兼秘书长秦锦屏,深圳市作协副主席蔡东,深圳市评协副主席汪洋6位专家学者参与对话,深入探讨城市与文学的互动关系。

城市书写的空间与时间

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深化,越来越多的人从乡村流向城市,今天的城市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无数人安身立命的“此地”与“此刻”。空间与时间的维度是作家书写城市、评论家评析城市文学、理论家建构相关概念的切入点。此次文学对话的第一个话题围绕“城市书写的空间与时间”展开。

薛舒分享了自己童年时期的文学启蒙。她从家乡上海川沙江镇的“赤脚医生”王桂珍1974年代表中国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第27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事迹,和以其为原型创作的由谢晋执导的电影《春苗》中真切体悟到文学虚构与现实真实的深层关联。“一部极具时代性、极具城市地方特色的好作品,哪怕是虚构的,仍然能让读者或观众从中感受到真实。”她提到,城市并不只有高楼大厦。“当我们在说城市的时候,除了高楼大厦之外,城市的时间切片和空间纵深,也是写作者有责任书写与思考的深层内涵。”李伟长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可,他谈到,一座好的城市应该要给予居住其中的人提供安慰、安抚和归属感。“我属于这里,在这里我是安全的、自由的——如果能给人带来这种“情绪价值”,那就是好的城市文化氛围。”在他看来,深圳作家林棹的《潮汐图》很契合他想象中的城市文学。这部作品饱含海风气息与置民生活图景,尽显南方城市特质。李伟长援引了《千里江山图》作者孙甘露的说法,“一种未经恰当描述的生活,几乎是不存在的”,认为多数城市仍处于被书写的过程中,而这正是城市文学的魅力所在。蔡东认为,城市文学的时空感知至关重要,深圳两城虽特质各异,但在城市文学谱系中都很很有特色。中国的许多超大城市面临着外在景观城市化充分、内在人口城市化不足的共性问题,这使得城市人群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定生活状态,如空间感上的封闭性、时间感上的临时性、漂泊感与不确定性等,这些感受



“现代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化表达——上海·深圳城际文学对话”活动现场

也体现在精神层面。文学可以尝试呈现这种复杂而多变的状态,捕捉这些生命经验,并作出高度凝练的、充分艺术化的表达。“现在的写作者如果能够写出城市的一个侧面、一种状态,就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她谈到,好的城市文学的书写与研究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永远不会过时,她也期待未来的城市文学中能出现有穿透力和标志性的代表作品。

城市的空间丰富而驳杂,难以窥见全貌,也会随着时间的不断推演而出现新的变化。对一座城市产生体验式的认知需要细心、耐心和共情能力。在项静看来,可以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视角建构关于城市的整体文学印象。比如,“在地者”对于上海的印象,恰如《繁花》作者金宇澄所说的那样,上海是深不可测的一座原始森林,人们站在迷雾中,哪怕一生都在上海度过,也只能在有限范围里看清一点附近的轮廓。而“旅行者”的视角,往往能跳出局限,看到一座城市的整体格局,以更广阔的视野认知城市,甚至延伸至全世界。秦锦屏谈到,时间与空间指向的是城市文学表达的广度与温度。谈及深圳的城市精神,她表示,城市不仅是地理存在,更是重要的精神载体,容纳了丰富的个人情感和人文特质。作家需要一双妙手和一对发现生活的慧眼,才能从历史的长河中打捞值得书写和呈现的细节。“无论时间如何延长、空间如何拓展,人们对于文化与文明的向往永远不会衰亡。”汪洋从初次来到深圳的感受谈起,分享了现代城市生活的具身经验。他认为,现代城市是景观鲜明、分工精密、充满生活丰富性的舞台。城市的时间与空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深而出现了新的变化,他谈到了纪录片《美国:我们的故事》,其中《城市》一集聚焦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转折以及工业化如何重塑城市面貌和社会结构。他认为,深圳和上海本质上都是现代立体城市,逐渐碎片化的时间感和向上拓展的立体空间,已让社会学意义上的“附近”概念逐渐消解。当下,如何在生产型、

功能型的城市中重构时空,重新确立我们与“附近”的连接,是作家需要回答的难题。

城市文学的求同与存异

伴随现代化与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之间的差异正在逐渐缩小,人们的生活状态日益趋同。未来的城市文学创作,是否也会随之走向同质化,将成为待解的问题。此次文学对话的第二个话题围绕“城市文学未来的发展是求同还是存异”展开。

薛舒结合自身成长经历,谈到了上海城市内部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表达。回忆起幼时的观影经历,她从《追捕》《孤星血泪》等译制片里的爱情桥段中,引申出城市文学里书写情感关系的重要性。“当我们被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的情感故事吸引时,总是能让那种‘悬在半空中’的心理感受逐渐淡去。当下的文学作品太吝啬讲‘爱’了,总是讲‘不爱’。‘爱’的传统应该在城市文学中恢复。”她认为,“爱”的情感联结或能消解城市居民的漂泊感与不确定感,构筑稳定的精神内核。“未来的城市文学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让人的情感被再次唤醒。一座城市越年轻,情感表达越强,城市文学就会越有魅力。”李伟长谈到,城市文学的魅力源于人的活力。他以深圳作家钟二毛的经历为例,提出未来城市文学的核心应该是书写具体的人。人们更在意的是如何与生活、城市、社会、时代建立更加紧密的、更有归属感的、更加确定的联系,因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此外,他还特别谈到,城市文学不必与乡土文学对立起来,理论评论不应拘泥于对文学作品进行划分与归类,两者虽然存在明显差异,但殊途同归,城乡文学共同体内部的精神共性更值得关注。项静强调了“人的重要性”,认为许多经典文学作品虽然没有聚焦于某座城市,但读者依然能从中感受到城市打在一个人精神上的烙印。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任何城市文学都是“存异”的。19世纪50至70年代,

世界城市文学在纽约、巴黎、伦敦等城市勃兴,同一时间段内,上海开埠后成为具有文学性的现代都市。可以说,中国城市文学的发展繁荣与世界同频,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城市精神”,它跨越阶层、地域和空间对人的限制,为今天的城市文学赋予丰富主题。因此,未来的城市文学需要以“做加法”的方式吸纳多元书写,呈现不同城市的独特之处。同时,城市文学也有“求同”的精神内核,应积极回应人类共通的生存命题。“文学也是哲学。我们如何回应生存法则,怎样让自己活得有意义、有价值,都是城市文学要回答的问题。”

蔡东谈到,城市文学的创作不会趋同,每位作家面对城市都有独特的书写方式。上海的城市书写因积淀深厚而颇具神韵,不仅能体现出上海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特点,也展现了作家个体对城市的想象和创造。她从深圳作家吴君近年来的创作中观察到,深圳的城市书写相较于其他城市来说,显得非常鲜活,更具生活质感。这些关于当下生活的书写,都在重新结构和定义中国当代城市文学。汪洋谈到,当下的城市文学与艺术正在重新记录和建构我们的公共生活,很多年轻人在情感教育上的缺失恰恰需要文学和艺术来弥补。他以长篇小说《同乐街》、电影《苏州河》等反映两地生活的文艺作品为例进行分析,期待深圳能产出更多彰显城市影响力的文艺作品。“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腔调,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表达。”秦锦屏认为,未来的城市文学创作应该是求大同、存小异。不同的创作者以独特方式书写城市,讲述故事里的中国和中国的故事,最终都会指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城市在生长,文学在回响。当海派文化的温润底蕴与岭南文化的青春鲜活在对话中交融,6位嘉宾围绕“时空书写”与“求同存异”的思辨,是回应“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时代命题的生动探索,不仅为新时代城市文学创作提供了多元路径,也为文明城市建设注入了持久的文学力量。

专家研讨艺术地理学视野下的戏曲与河流关系

本报讯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山东艺术学院科研处、戏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艺术地理学视野下的戏曲与河流关系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听取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黄河流域戏曲文化研究》的篇章结构和基本观点,以及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黄河流域戏曲文化研究”的进展情况并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与会专家表示,文化地域性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传统,体现了研究者的时代使命与学术自强。河流与戏曲关系的选题既有前瞻性,又有拓展性。黄河代表了农耕文化特点,运河体现了

商业文化底色。在戏曲与河流的动态关联中存在生态关系、文化属性的流变,要注意结合点、线、面进行研究,要强调人的主动性、主体性,还要坚守学术严谨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旭谈到,对于戏曲文化品格,要有一个重新赋予、释读的空间。需从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思考戏曲如何彰显民族化和自主性。河流与戏曲的关联对于形成戏曲的多样化具有重要作用,而审美研究是戏曲研究的重要指向。此次会议深化了对于“水脉”滋养“文脉”内在逻辑的理解,拓展了戏曲研究的新维度,将有力推动戏曲与曲艺学科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路斐斐)

2025年是北京市文联成立75周年,徐悲鸿先生正是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发起人之一,并当选为北京市文联筹备委员,出席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的大会,周恩来总理亲临讲话,极大鼓舞了首都文艺工作者投入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徐悲鸿先生原名寿康,后改“悲鸿”为名,如鸿雁振翅,划破近代中国艺术的迷茫迷雾,躬身求索,以精微之技、致广大之心,写就丹青报国传奇,其风骨如岱宗巍峨,其精神似江河奔涌,跨越岁月山河,光照华夏大地,滋养无数从艺后辈。

徐悲鸿先生为家国社稷致学不辍,初心如磐辉映丹心。他出生于江南宜兴的书香门第,自幼承父习画,笔墨意趣传承经典气韵风骨,厚植家国情怀种子。彼时山河破碎,风雨如晦,先生深知艺非小道、关乎国运,少年壮志藏于笔端,不甘沉湎安逸,遂以“悲鸿”为志,负重远游。1919年,他远赴法兰西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求学,在伦勃朗的明暗光影中悟画法,于西洋油画体系中炼真功,深究解剖透视之奥,锤炼造型写实之精。8年游学岁月,焚膏继晷,栉风沐雨,埋首画案,汲西艺之精髓,却始终心系故国苍生、家国之殇。他笃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致力借他山之石,琢中华艺术之玉,以笔墨为刃,护家国山河。从少年到暮年,这份以艺报国的初心,从未改易,如明月照江河,澄澈坚定,矢志不渝。

徐悲鸿先生为艺术教育开辟新天,杏坛执鞭广育栋梁。1927年,先生载誉归国,彼时中国美术教育积弊已久,或固守传统,墨守成规,或盲从西洋皮毛丢失本源。彼时,先生以先行者的勇气与担当,扛起了美术教育革新的大旗,先后执掌中央大学艺术系、执掌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与中央美术学院首任院长,以一己之力,擘画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宏伟蓝图。他打破中西壁垒,摒弃门户之见,以融合中西、写实为基,构建起科学系统、兼容并蓄的美术教育体系,让西洋素描的严谨与传统笔墨的意境,在课堂之上相融共生。他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待弟子如亲,倾平生所学倾囊相授,不遗余力提携后学。其亲传弟子杨先让忆及师恩,动情言道:“我永远感恩先生一家,他去世时没给家人留一分钱,没能来得及留一句话,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徐悲鸿先生一生清贫,却将心血悉数浇灌于杏坛,为新中国艺术种下茂密森林,培育出大批美术栋梁,奠定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根基,这份无私赤诚,如春风化雨,泽被后世,它成为中国代代相传的

徐悲鸿先生致力中西艺术贯通融合,开拓写实艺术高雅之风。中华书画千年传承,至近代步履维艰,革新之声微弱。先生以高瞻远瞩之见,早在1918年发表的《中国画改良论》中就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者融之”的革新箴言,以开阔胸襟打通中西艺术的壁垒。他深植传统根基,早年临摹经典打下扎实笔墨功底;又深耕西艺精髓,精研解剖透视让造型精准生动,在巴黎临摹伦勃朗时学得明暗对比之法,与中国传统写意笔墨相融,成就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他笔下的油画《田横五百士》,以西洋写实技法刻画人物风骨,以传统笔墨传递忠义之气;中国画《奔马图》以精准造型勾勒骏马雄姿,以酣畅笔墨抒发行云流水之韵,真正实现了中西合璧、形神兼备。他批判画坛陈腐颓败之风,主张艺术当扎根现实、映照时代,让高雅艺术走出象牙塔,与国家命运同频,与苍生冷暖共鸣,这份创新融合的智慧,让古老的中华书画焕发新生,为艺术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

徐悲鸿先生为中国抗日四方奔波,以画为旗唤醒国魂。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山河沦陷,生灵涂炭,先生毅然放下画笔,奔走于海内外,以艺为媒,为国募捐。他远赴南洋、欧美举办画展,将画作义卖所得悉数捐给前线,支援抗日救亡;他挥毫泼墨,以笔为枪,创作出《风雨鸡鸣图》《愚公移山图》等震撼人心的佳作,以风雨中昂首啼鸣的雄鸡,隐喻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气节,以挖山不止的愚公,象征国人众志成城、共御外侮的决心。他深知,艺术不仅是审美之器,更是精神之旗,能凝聚人心、鼓舞士气,能让人民在绝境中看到希望,在苦难中坚守气节。他以赤子之心,为抗日奔走呼号;以丹青之力,唤醒民族魂魄——这份为国为民的担当,划破黑暗,照亮了抗战救亡的前行之路,让文艺的社会价值在烽火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徐悲鸿先生为中国艺术走向世界开先河,架桥铺路通达寰宇。作为最早系统学习西艺并归国革新的艺术先驱,先生始终以开放之姿,推动中国艺术与世界对话。他在欧洲游学之时,便以精湛技艺得到西方艺术认可,让世界看到中国艺术家的深厚功底。归国之后,他始终坚守民族立场,带着中华艺术的精髓出国门,让《奔马图》的雄健、《愚公移山图》的坚毅,展现在世界面前,打破了西方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刻板认知。他不卑不亢,既不妄自菲薄盲从西化,也不故步自封排斥外来,以中西融合的独特艺术风貌,在世界艺坛树立起中国艺术的标杆,让中国书画从东方一隅走向世界舞台,为中国艺术走向世界开辟了先河,架起了一座跨越山海的文化桥梁,让中华艺术之美惊艳世界,流芳远播。

徐悲鸿先生为中国书画艺术立碑树范,风骨永存光照后辈。他一生践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让艺术扎根现实、观照民生,倡导写实性与思想性。他以中西融合的艺术实践,为书画革新提供了可学可鉴的范本,让后世艺术家懂得传承与创新的辩证之道;以丹青报国的赤诚,为艺术从业者树立了“艺载道、画传情”的精神标杆,诠释了艺术家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1953年,先生溘然长逝,他的夫人廖静文女士深悟其初心,将徐悲鸿作品千余件及书画藏品千余件等悉数捐献国家,建成新中国首座个人美术纪念馆,让先生的艺术与精神得以永久滋养后人。徐悲鸿先生以一己之力为国画艺术种下一片森林,其精神甘露滋养中华艺术生生不息。

百卅春秋弹指之间,大师风范永续流传。徐悲鸿先生用一生的坚守与求索,为中国现代艺术树起一座不朽丰碑。我们纪念徐悲鸿先生,不仅是缅怀他的艺术成就,更是为传承他的精神风骨——那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那融合创新的开拓精神、那躬身育人的无私品格、那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愿艺坛后辈,能承先生之志,继先生之遗,不负人民殷殷期许,以笔墨传薪火,以丹心绘山河,让中华艺术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作者系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风骨永存 光照后辈

——写在纪念徐悲鸿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

□马新明

中国文艺美学的学术传承与学科发展学术研讨会举办

本报讯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优势学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主办的“其命维新:中国文艺美学的学术传承与学科发展”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及科研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通过主旨报告、分题研讨等形式,回溯中国文艺美学的发展脉络,围绕学科理路与研究图景、学科品格与发展潜能、学术互鉴与创新思路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为新时代中国文艺美学依托自身独特理念与方法实现突破跃升、贡献理论力量建言献策。

与会学者认为,中国文艺美学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是突破西方理论范式束缚、彰显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成果。文艺美学之新在其守底蕴、主包容、促开放、有气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文艺美学研究者应持续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结合,在平等的国际学术对话中实现理论创新,开辟出中国文艺美学的新前景、新路径、新境界。

(路斐斐)